

国图所藏五部陈垣批注史籍

陈晓华

陈垣先生自少年读经始,其阅读原典就与其治学相始终,终生不辍。这为先生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就了他的博学与卓识。与其读书相应,陈垣先生也好收书、藏书,其收书、藏书并非止于文人的闲情雅致,而更意在读书治学,“凡经其手之书,大都经其阅读”。每读书有所见,辄随手题记,其相当一些藏书“是他仔细阅读、认真批注过的”。从留存于这些藏书眉端行间的批注校正,我们可以了解到陈垣先生“当年孜孜治学的真实过程”,也可以看到他“对于相关学术问题的真知灼见”^①。这些真知灼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并指示了读书治学之法。今梳理国家图书馆所藏陈垣先生批注史籍五种,简介于下。

一、有关元史研究三种批注本

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奠定了其在元史领域的开创地位。不过,我们知道,对于元史研究,陈垣先生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大量的思考还见诸信札批注中。阅读其归入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蒙古源流》、《蒙兀儿史记》、《元朝典故编年考》中所做的批注,就可以发现其研究元史之迹,见其治学之法。其用功之深,思考之敏锐,豁然于批注之间。

(一)《钦定蒙古源流》(清人小彻辰萨囊台吉撰,刻本,共4册,8卷)

《蒙古源流》成书于清康熙元年(1662),1766年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扎布,将抄本一部进献给乾隆,乾隆下旨译成满文,1790年前后译成汉文,题为《钦定蒙古源流》,并收入《四库全书》。由于语言翻译、民族风俗差异、四库修书时的加工等原因,造成汉译本讹误不少,故而陈垣先生阅读时用朱笔做了许多校订。其校订大约有下列几类:

(1)改。有如下几类:音近而误者,如将“提要”第2页“知奇握温为却特之误”之“握”改为“渥”,卷四第11页“其图类汗之苏喇克台伯殷太后”之

^①张廷银:《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文献》2009年第2期,第164页。

“类”旁批“赖”。时代之误,如改“提要”第3页“娶唐太宗弟”之“太”字为“中”。形近而误者,如改“人以明太祖”之“人”为“又”字,改“提要”第5页“举兵廸逐顺帝”之“廸”为“迫”字,改卷二第4页“巴喇木巴干尔瑞汗之公主”之“干”为“幹”、“瑞”为“玛”,等等。

(2)增。在“提要”第5页“亦往与史乖迕”之“往与”间加“往”字,“提要”第1页“值之辰告成书”前行间夹写“值之辰起至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当”,在卷一第2页“起于风坛则由无所有”之“坛则”间补写内容“次及木坛定于土坛是也,以言乎风坛”,同页“而水坛矣”之“坛矣”间加“定”字,卷七第8页“夜即梦一穿黑人前来,执一水晶靶之刀,向伊心窝刺,次早遂自鼻内流血而死”之“黑”后加“衣之”、“刺”后加“之”,卷八第5页“内众官商议”之“官”后加“员”。

(3)删。即删去衍文。如圈去“提要”第2页“书中所给纪”之“给”,圈去卷二第6页“有遗胎复子对苏陇生”之“胎”字,圈去卷五第1页“福晋皇子俱出”之“俱”,圈去卷八第10页“多地方恳求”之“地”,圈去卷八第15页“妻苏台吉太后”之“吉”,圈去卷八第19页“弟景泰汗即庚子年生”之“即”。

(4)乙正。矫卷一第1页“噜嘛雅尼”为“噜嘛尼雅”,调卷八第5页“阅六月,即于是年歿”之“阅六月”为“六阅月”,将卷二第6页“驱遣世界中神道”之“驱遣”换为“遣驱”。

陈垣先生的这些校订,史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首先,《钦定蒙古源流》作为以国家之力整理的研究蒙古民族史的汉译范本,有推广蒙古民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推动民族间文化交流之功。然而,遗憾的是,其中内容、年代、史实的讹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以上功用。而陈垣先生的校订恰可弥补其缺陷,正本清源,使其史学价值得以彰显。因此,陈垣先生的校订就不仅于《钦定蒙古源流》本身很有必要,对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传播,乃至民族间和谐友好互动,价值也是不小的。其次,陈垣先生的这些校订,以其深厚的校勘功力,也指示了后人阅读、整理古籍之法。

(二)《蒙兀儿史记》(清屠寄撰,民国间刻本,共14册,160卷)

《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英文、日文、俄文、瑞典文资料多靠朋友和儿子的翻译,如友人周秉清为他译述瑞典多桑的《蒙古史》,儿子孝实翻译了美国人乞米亚可丁(Jeremiah Curtin)的《蒙古人史》、《俄国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亚旅程》,孝宦译英人所著《史家之历史》等。由于译者并非元史专家,加以这些资料本为二手材料,多未经考证,故错上加错。此外,在“主因”、“幹脱”等非汉语名词对音勘同上,错误也颇多。不少考证也不够严谨,牵强武断。这为阅读者留下了考证空间。陈垣先生批注《蒙兀儿史记》就着力于以上方面。下面以《蒙兀儿史记》第十一册数例批注见之。

《蒙兀儿史记》第十一册卷六下前有一纸条上书:“撒儿塔兀勒即是中亚回回之称元人,常以种人为人名,惟旋其后缀以属格之,tai,此处之撒儿塔带

(Saitatai)是人名不应删。”卷八第六和第七页间所夹纸条上书“十八年十月旧纪之干不昔与二十九年七月之甘不察同是 Kamlojou,即是真腊或柬埔寨,屠氏前误作佛齐,后既知为柬埔寨,又误改作阇婆,阇婆盖爪哇也。”卷八第十八和第十九页间所夹纸条上书:“《阿老瓦丁传》之木癸里应里西北地附录之主夕里,《元史》所本之名似为木夕里,《元史》诸本此名皆误作‘癸’,洪武本亦然,谓为法即本癸里,未免过于附会。屠氏此类,附会甚多,举不胜举。”卷九第三和第四页间所夹纸条上书:“斡脱是 Oigog 之译名,洪考误作犹太,此是回教徒一种商业组合之称,犹之现在之洋行。”卷十一《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本纪第九》第1页小注中讨论了日期的问题,认为旧纪日期有误,陈垣先生认为旧纪不误。其眉批为:“大德十一年丁未,三月乙丑朔,二月丙寅,旧纪不误。”

又,在中西交通方面,中西回史日历的换算一直困扰学界,陈垣先生通过对中西回史的研究,找到了换算出中西回史日历的方法,著成《二十史朔闰表》,并在中西交通研究实践中运用中西回史日历的换算成果,以便于读者阅读。在《蒙兀儿史记》批注中,我们就可经常见到陈垣先生对中西日历换算的关注。如以墨笔在眉端处批注“西二月十九为宋历正月十七日”^①,以墨笔在眉端处批写“丁亥年七月十二日己丑,即西历八月廿五日,多桑书谓辛卯,西八月十八,盖据格列奇是历,旧史实七日”^②。“战期在西一二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中历七月辛卯日……”批注为:“西八月廿七乃中历辛卯,廿六则庚寅也,西八月十八日壬午,《元史》云太祖七月十二日己丑崩,西八月廿五日也,多桑氏日系格列奇是历,故差七日。”^③“或谓太建二年生”批注为:“照格列奇历新历为四月廿日,然儒略历当为四月廿四日。”^④这些有关中西日历的批注解决了《蒙兀儿史记》困惑读者的中西日历问题,记录下陈垣先生对中西交通研究的深入与熟谙,显示出先生深厚的为学功力。

众所周知,研究元史,中西交通本就无法跨过,故这些成就的取得也当是陈垣先生本人研究元史重视中西交通的结果。而陈垣先生从事元史研究之始即明晰于此:他弃医从史的第一篇文章《元也里可温教考》,就是谈元史的,而且是从中西交通说起的,可见其自研究元史始即抓住了元史研究之命脉。《蒙兀儿史记》是研究元史必读之作,在阅读中,陈垣先生自然把自己治元史关注中西交通的要领与治学之道结合起来。二者相长,在加强元史研究注重中西交通的同时,无疑也在纠谬正讹基础上夯实了文献及理论,给后人留下了研究元史的可靠材料。当然,也正是基于元史研究中关注中西交通,陈垣先生在元史研究及中西交通两方面均收获不菲。对于其中西交通研究,日本学者桑原隲藏

①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民国年间,第1册,第27页。

②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第1册,第31页。

③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四五,第8册,第8页。

④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百七,第8册,第1页。

称其在大家对如何研究中西交通皆未得要领之际,已有中西研究之心得,并启中西研究之绪,裨益时人甚多,盛赞陈垣先生中西交通研究独到与引领之功^①。这种独到及引领之功是从元史研究中来的。陈寅恪更赞其以静思博识,成为钱大昕以来第一人,并称其有关元史中西交通研究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极具功力^②。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所赞的元史研究成就与中西交通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今读其《蒙兀儿史记》批注有关中西订讹纠谬材料,如诸先生所言,赫然纸上,历历在目。

除精审考证《蒙兀儿史记》中西交通史实外,陈垣先生考证之细致精密,如“下令环攻,是日水曜”批注为“元太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水曜”^③,具体到皇帝在位年月日;“宪宗八年正月”批注“宪宗八年正月六日”^④,具体到日。此类批注,在《蒙兀儿史记》中历历可见,足可补原书的粗疏讹误。

此外,陈垣先生批注《蒙兀儿史记》还有其独特之处。陈垣先生自1896年读《四库全书总目》,知目录为读书门径以来,其治学尤为重视目录,对《蒙兀儿史记》的批注就颇体现出这个特色。《蒙兀儿史记》第一册书中夹有一张纸,纸上记《蒙兀儿史记》全套书各册的页数。凡例第一页眉端处以墨笔批注,以明版本。目录各页标明所在册数,互见卷数。陈垣先生在目录上所做的这些批注,看似为自己阅读方便的闲笔,但其实却是其用功之深,读书之细的见证,也为我们指示了读书治学之法。陈垣先生清查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即是如此,每阅一册,即详细登载页数及排架情况,最后形成总的册数页数表,解决了看似无关紧要却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读书治学需从目录入手,这是陈垣先生告诉我们的读书治学之法。

以上特征在《蒙兀儿史记》批注中贯穿始终。由此可见,《蒙兀儿史记》的批注虽着力于校勘,但其校勘非仅正误纠谬,更是心得之抒发,和研究并无二致。

(三)《元朝典故编年考》(清孙承泽撰,螺树山房丛书,刻本,共四册)

《元朝典故编年考》的批注主要是对校。如卷九第1页“诱他战”眉批为:“诱他战,韩、杨本均漏‘他’字,叶本三页。”卷九第六页“客先”眉批为:“客先,韩、杨本作客薛,叶本四一页。”卷九第9页“达达祖宗废了”眉批为:“‘达达’,杨本作‘速速’,韩本亦然,是《大典》本之误显然,叶刻不误。”该书原本就有方便世人于正史之外了解元人及其朝代之功。因此,校订后的《元朝典故

①(日)桑原鹭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6期(1925年11月),第9页。

②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励耘书屋丛刻》第1集第1种,1934年,第2页。

③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四四,第8册,第9页。

④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百七,第8册,第18页。

编年》当更能担当起补正史之缺,更好为元史研究材料之责。

综上所述,三部有关元史方面的书籍,因存在翻译问题,材料问题,及非汉语名词对音勘同问题,尤其是后两部以汉人著述蒙古史事,由于时代、语言、风俗、印制、校对等原因,错讹颇多,如不仔细校勘,必然影响阅读与研究。为此,陈垣先生做了详细的校正,圈点处颇多。在校正中注重多种校勘方法的运用。如本校法。或据上下文改,如《蒙古源流》卷一第2页“而水坛矣”之“坛矣”间加“定”字,因有“木坛定于水坛”句,故可判定“坛”后有“定”。或据前后文改,如《蒙古源流》“提要”第1页“值之辰告成书”之“辰”后添“起至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当”,此添加之句又可见于《蒙古源流》卷八第22页“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当值之辰告成”。理校法,如在《蒙古源流》“提要”第5页“亦往与史乖迕”之“往与”间加“往”字,改《蒙古源流》“提要”第3页“娶唐太宗弟”之“太”字改为“中”等,均属此类。以及在《元朝典故编年考》中大量使用的对校。在校勘时,陈垣先生严守实事求是精神,不能定论者,就疑以阙疑,《元朝典故编年考》的校对尤能显示此特征。

经过陈垣先生的校正,三部有关元史的书籍,史料更加翔实可信,其价值的提升不言而喻。

二、其他史籍批注本

(一)《十七史商榷》(清王鸣盛撰,光绪十九年秋七月广雅书局校刊,共100卷,14册)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历史要籍,但陈垣先生,并不盲目崇拜,他以精审的眼光纠正了其中不少错讹。

纠正王鸣盛读书不仔细之误。如《十七史商榷》卷六三第16页“《南史》无傅岐”眉批为“见《循吏传》,何谓无”,“裴氏八十卷之旧”眉批:“《索隐》序作合为八十卷,合并也。”卷六十四第28页“避讳”“但称中从事”之批注:“非称中从事,中上空格耳。”

纠正王鸣盛观点之讹。如《十七史商榷》卷八“而为陆终后亦何据乎?此矣可笑”眉批“当时知几必有据,今谓其何据,亦可笑”,为刘知几正名。卷五三第4至5页“何多幸也”眉批:“位卑不卑与著述何关。”表明著述与身份地位无关。以上二例,在纠正他人观点之误外,更可见陈垣先生的道德文章。卷五五第10页“《南齐书》三十八……”眉批:“王羲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之’非排行也。”王鸣盛对“之”认识不够,认为可以代表排行,陈垣先生举王羲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驳斥了其论,纠正了其认识的欠缺。

纠正不明避讳之误。卷六五第2页“令狐德棻等《周》《隋》二书”批注:“魏澹字彦渊,见《史通·雅说》篇下,《隋志》作彦深,《德棻传》避讳空、渊字,后人连写,非误也。”

此外,就王书引用材料等学术问题做出了点评。如卷五三第3页“姚思廉

《梁》《陈》二书”“《旧唐书》……”眉批：“《旧唐》非难得之书，何至引一大段。”指出引用材料当更注意新材料。卷十七“县名相同”条眉批为“应列表”，卷八四第3页“旧唐书各传无字者多”条眉批也为“应列表”，提醒读书治学应重视“表”的功能。又关注王鸣盛书各本正误。卷九八第1页“欧史脱文误字”钢笔朱色批：“德王裕，殿本不误；军乱，殿本不误；为字，殿本不误；友能，殿本不误；德胜南城，殿本不误；殿本衍后字。”同时，也对王书不足进行补充。如卷九“哀纪赞矛盾”补为“哀纪赞（与董贤传）矛盾”，卷六四第7页“樵者在山”“见《文选注》引”批注：“谢诗云：‘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何琦见《晋书》八十八《孝友传》。”进一步解释说明批注原文。

至于不能定论者，陈垣先生则存以阙疑。卷四十八第2页“王夷甫”眉批：“疑本梁人作，晋史避梁武讳字。”存疑以待进一步研究。

《十七史商榷》为考史名著，影响很大，后人一般以之为经典，作文也多引以为据。陈垣先生对其实事求是的校订与评判，也就打破了迷信，还原了真相，补充了不足，摆正了观点。就此而言，无疑也给世人提供了一个更有价值的《十七史商榷》。

（二）《旧五代史》（宋薛居正撰，吴兴刘氏嘉业堂民国十四年刻本，共150卷，目录2卷，32册）

《旧五代史》到清朝已散佚了，后来的邵晋涵辑本虽佳，但为避当朝讳，凡涉及民族等清朝忌讳问题，均有所篡改，严重影响阅读和研究。故而，陈垣呼吁重辑《旧五代史》，并以详细可行计划公之于世^①。其呼吁并非空穴来风，是建立在对邵晋涵所辑《旧五代史》坚实研究基础上。通过研究邵晋涵所辑《旧五代史》，陈垣先生指出当年邵晋涵辑佚实多用《册府元龟》而非《永乐大典》，进而提出用《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等观点，并写有多篇学术论文为之张本，从其批注《旧五代史》可以见到他所做的准备。

《旧五代史》陈垣先生所做批注主要也是校订，其类别也为改删增补之类。

（1）改。以卷三、卷四为例见《旧五代史》与《册府元龟》之关系。卷三第5页批注将正文中小字“《册府元龟》一百八十六”中的“八”用朱笔圈出并用墨笔改为“九”，第11页批注将小字“《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九”改为“《册府元龟》卷二百二”、将小字“《册府元龟》卷九十五”改为“《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十五”、将小字“《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十四”中的“四”用墨笔改为“五”。卷四第2页批注将小字“《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七”中的“一”用墨笔改为“二”、将小字“《册府元龟》一百九十七”中的“七”用朱笔圈出并墨笔改为“四”，第6页批注将小字“《永乐大典》卷五百六十”中的“六”用朱

^①陈垣：《以〈册府〉校薛史计画》，《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46-147页。

笔圈出并墨笔改为“二”，第8页批注用墨笔移“唐寅，亲享太庙。《册府元龟》卷一百八十九”于“辛卯”之前，将小字“《永乐大典》卷四千三百七十六”中的“六”改为“五”。由以上两卷分析，《旧五代史》据《册府元龟》所辑之迹明显可见。

(2)删。将目录下第6页小注“案此名新增”划去，卷二第17页将正文中的小字“案以上疑有阙文”、“闻潞”、“州陷故也”用朱笔划去。

(3)增。卷一第7页“会夜收军牛马”“军牛”二字之间用墨笔加一“获”字。卷二第17页用墨笔批注“闰月，晋人燕人同攻潞师，丁曾举城降于太原，帝闻之”，加入原文“遂自长芦班师”之前。卷二第17页眉端处朱笔批注“大字据《册府》187补”。

(4)点评。该书眉端多处批有“另行”^①、“已入注”^②、“照殿本”^③等。“另行”即另起一段。“已入注”，指前文某处对此事已作有注。“照殿本”指参照《旧五代史》辑本之一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这些批语显示陈垣先生批注此书的全局意识与综合观照。

此外，尚有综合校正之批注，兹不一一举例。

对邵晋涵所辑《旧五代史》的校正，使陈垣先生不但广泛阅读了大量相关史籍，而且进一步熟悉了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之优劣，为他提出重新辑佚《旧五代史》提供了思路。对于今天研究、重新辑佚《旧五代史》亦提供了理论基础、可操作法则，以及更为精审的批注本。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正是受陈垣先生重辑《旧五代史》思路的启发，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从1994年始，历时11年，终于辑成新《旧五代史》的。

综观陈垣先生批注的五部史籍，既纠谬正讹，还世人一精确版本，消除了资料本身的不实之弊，又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理论，提出可操作的法则，指示了读书治学的不貳法门，启迪后学，彰显出一个贯通古今中外的史学家的功力、卓识与博通。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①卷一第2、3、5、6、9、10、11、12页，卷二第2、4页等。

②卷十五第14页，卷十六12页等。

③卷三第12页，卷四第5页等。